

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
(一)

出版前記

編輯叢書以保存及流傳資料，在中國已有七百六十餘年的歷史。

在這悠長的歲月中，歷代刊行的各種叢書號稱數千部，其中個人詩文集約占半數，內容割裂實際不合叢書體例的又居其餘之半，其名實相符者仍有數百部；即經過商務印書館再三精選後刊行的「叢書集成」，內含各種叢書也有一百部之多。這在中國出版界真可說是洋洋大觀，對於促進歷史文化的研究與發展實在有難以形容的價值。

但在這樣龐大的數量中，使用「史學叢書」名稱的却只有清光緒年間廣東廣雅書局的一部。

事實上：歷史學在中國是發達最早的一門學問，二千餘年來連綿不斷地繼續發展，並且隨著時代演變更新進步。在世界文化史上，中國史學真可說是一枝獨秀。近年以來，中國歷史文化的研究成爲世界各國學術界一時風尚，中國史學先哲前賢的珍貴而豐厚遺產，更受到舉世的重視和尊敬。惟其如此，我們自然可以堂堂正正高舉中國史學的大旗，這就是本叢書命名的由來。

中國史學的範圍非常廣泛，要想在這一部叢書中包羅萬象，是事實所不許；今惟有在適應當前中外學人的普遍興趣以及編者固人學識能力的原則下，決定一個方向，就是以明清史料作本叢書選輯的優先對象。

至於史料的選擇取用，主要原則在「實用」與「罕見」，由編者綜合若干有關專家學者的意見而後

決定；是這樣地集思廣益，應該可以適應一般需要。

對於史料的形式，也就是版本，儘可能選用初刻或精刻的善本，在「罕見」的原則下自然更注意搜求手寫稿本。

印刷方法是完全按原版影印，不加描摹，因為此時此地印刷廠沒有描摹的人才；並且爲適合國內多數學人的購買能力，對於許多卷帙浩繁的書籍是採用縮小影印方式，以減少篇幅降低成本。至於罕見的手寫稿本則儘可能地按原書大小影印，以便閱讀。

選印在本叢書內的每一史料也就是每一部書，編者都儘可能地約請專家學者撰寫序跋，指陳其價值或版本異同，中外學人當可一目瞭然其書內容大要。

儘管在編印體例上有若干與衆不同的改進，但一定還有許多疏漏的地方，希望海內外方家多加督責，以便隨時更新。

朱相湘

中華民國五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於臺北市

天主教東傳文獻序

中西文化的接觸與交流，是影響中國歷史方向的一件大事。因此，「中國史學叢書」進行編輯的時候，就注意這一方面的資料，並且以搜求海外廢藏罕見的明末清初刻本或寫本爲最高目標。

天主教羅光總主教本其史學研究的濃厚興趣與淵博學養，對於編者這一計劃慨允給予各種支持與贊助，並立即親函羅馬趙雲崑神父往梵諦岡圖書館接洽攝製膠片。於是「天學初函」影印本及「天主教東傳文獻」初編就如期在李之藻先生誕生四百年紀念出版。現在「天主教東傳文獻」續編又繼之行世。

早在四十餘年前，馬相伯、英欽之兩先生就有重刊「天學初函」的計劃，陳援菴先生且有作「天學初函」續編或「公教叢書」的宏願。民國廿三年上海「聖教雜誌」並有刊行「天學二函」的預告（見方豪教授著「李之藻研究」第十一章）。嗣以種種原因，迄未能見諸實行。今相湘得追隨先賢前輩之後完成其所遺留的工作計劃千百分之一二，實在是拜受時代進步的厚賜。

羅馬教廷開明進步的政策，將梵諦岡圖書館珍藏的檔案圖書資料在一定時限內公開給學人閱讀研究。這比較四十餘年前，北京天主教北堂圖書館未建立借書制度，並不許馬相伯、英欽之先生參觀的情形，完全不同。加以羅光總主教久居羅馬並任教傳信大學，熟習梵諦岡圖書館內容，趙雲崑神父不顧寒暑，多次奔走洽辦，故得有今日成果。這是相湘應該特別向他們兩位致敬與致謝的。而三四十年来天主教內外學人編製的有關中西文化接觸交流資料目錄，顯微膠片攝製技術的精美，既可供按圖索驥，又可使纖毫畢現全不失真。這都是消除四十餘年前的困難，促成今日成果的重要因素。

如上所陳：馬相伯、英欽之諸先生既早有「天學二函」「三函」……計劃。羅光總主教手撰「天學初函」影印本序文中也期望「二函」「三函」的陸續問世。如今何以不以「天學二函」「三函」爲名，而稱之曰「天主教東傳文獻」？

相湘體認今如欲續纂天學書刊，實在必須超越李之藻先生前規，有計劃有系統有經費方能按時持續進行。這一重大工作，絕不是一人和一書局的力量所能負擔的。且大陸尚未光復，徐家匯土山灣圖書館與北平北堂圖書館等處珍藏，無法利用，專恃海外藏書，不能比較異同，亦難符合現代學術標準。故惟有在樸實無華一目瞭然的名稱下由相湘選擇若干「罕見」的重要史料，影印流傳，稍盡個人力量而已。

方豪教授、顧保鵠教授對這一「天主教東傳文獻」的印行，亦多贊助；既提供資料，又爲收錄的各種書刊分別手撰序文，指出其「罕見」的珍貴價值。這不僅爲研究近代中西文化接觸史實的學人提供新史料，也爲今後續纂「天學二函」「三函」……顯示一新途徑。這是相湘特別應該感謝的。

朱相湘

中華民國五十五年五月五日

影印天學說序

方豪

是書末題「明明子邵輔忠著梓」，自著自刻，且無序跋，爲明清間教會書所罕見。定海有邵輔忠，明萬曆二十二年進士，歷官工部郎中、兵部尙書，附魏忠賢。而明季天主教名士多與東林友善，或非其人。梵蒂岡圖書館外，亦未聞有藏此書者。

書首曰：「我明國從來不知有天主也」；又曰：「我明國學者止知尊信孔子」，則其爲明人書無疑。又曰：「今上復授泰西學者官，俾訂大統曆，於是其教益行於各省郡邑間，然不免有迷者、疑者、謬者。」按明季修曆，時作時輟，主要則在萬曆末與崇禎初，故所謂「今上」者，不外神宗與毅宗；但旣言有疑者、謬者，似指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沈淮等所引起之南京教難。

書中多以天主教學說附會於易，以天主爲乾元；又以時行者乾，物生者坤；下學者坤，是卑，法地；上達者乾，是崇，效天；又以聖母有坤之象，坤，母也，故懷子卽天主，係所生子也。又以天主有震之象，震，乾之長男也，代乾行權，故手握天。又以震、坎、艮解釋天主三位一體，頗足以一新耳目，然必不能爲當時教會所接受，故其書惟有自梓，且所傳不廣，遂致稀絕。梵蒂岡二屆大公會議期間，談造物主之啓示者，多欲求之於古代民族之斷簡殘編，實則此心此理，三百年前，已早見於是書；攝影而刊布之，正所以示此古今同然之心理，豈徒好古而已哉？

影印辯學疏稿序

方表

明季天主教傳入吾國後，雲蒸霞蔚，不旋踵而遍於全國，且多飽學宿儒，但好景不常，自利瑪竇入中國，僅三十餘年，而第一次教難即於萬曆四十四年（一六一六）五月爆發，以起於南京禮部侍郎沈淮所上第一疏，故又稱「南京教難」。七月，徐光啓亦以「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身份上疏辯護，即今據梵蒂岡圖書館藏明刻單行本所影印者。

此疏爲教會中最著名之文獻，傳刻傳抄，不一而足。余藏「辯學」抄本中，亦有是疏。康熙十五年（一六七六）刻成石碑，立於上海教會墓地。光啓孫爾覺、爾爵撰「上海縣城南耶穌會修士墓碑記」曰：「柏鐸師樹碑勒石，特揭先文定辯學章疏，以彰學師講學修道之跡，以著先公衛道廣學之傳。敬跋碑陰，以導來者。孫爾覺、爾爵謹記。大清康熙十五年丙辰八月穀旦。」

光緒二十二年（一八九六）上海慈母堂印行李杕編「徐文定公集」四卷、宣統元年（一九〇九）上海慈母堂排印本徐允希編徐文定公集六卷、卷首二卷、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徐宗澤增訂本（卷數同上）、民國五十二年（一九六三）王重民輯校「徐光啓集」十二卷、及民國二十六年蕭若瑟著「天主教傳行中國考」皆收有此疏，不僅未作詳校，且均有刪改，試舉諸本中刪改最著之例言之：

蕭書刪削之處，有註明者，如「處置之法」，曾說明「從略」；但亦有無一字註明者，如從「蓋彼西洋隣近三十餘國奉行此教」起，至「悉皆不妄」止。

徐宗澤增訂本，在「路不拾遺」之上，略去「上下相安」云云三十字；在「夜不閉關」之下，亦略

去「至於悖逆叛亂」云云二十四字。雖光啓所言，未免過甚其詞，但爲存真起見，實以不動原文爲宜。此外如改「天主」「上帝」爲「上主」等，猶其小者。此本雖爲後人所刻，故稱「徐文定公譚光啓具題」，但未署「萬曆四十四年七月」，而遇「聖明」「皇朝」「皇上」「聖躬」「國祚」「御覽」「恩賜」，皆抬頭示敬，其爲明刻無疑。影印本既出，則茲後引述此疏者，要不可不以是爲準矣。

影印鴉鸞不並鳴說序

方 象

「鴉鸞不並鳴說」一卷，吾杭鄉賢楊廷筠作。民國三十三年，余在陪都校訂楊振鐸先生著「楊淇園先生年譜」，並爲介紹於商務印書館印行，已收入此文，蓋明萬曆間，沈淮引起南京教難時，護教之作也。淮以天主教與白蓮教相同，楊公此文則舉其「皎然不同者」十四，「可察知其異者」三。

其時余與楊君所見者爲王重民氏自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本攝歸之照片，見古郎 (Maurice Courant) 編目六九一五之五號，該館「中文書目」(Catalogue des livres chinois) 謂共四葉，茲所據以影印者，則爲梵蒂岡教廷圖書館藏本，多半葉。書之末段實爲題跋，原書以小字刻印，而「楊淇園先生年譜」所排印者用同號字，又因缺最後半葉，故文末「武林淇園彌格子楊廷筠識」等字亦不可得。作者乃特撰「鴉鸞不並鳴說考略」以證其爲楊公所撰，有曰：

「至『鴉鸞不並鳴說』題跋之作，據原書照片，並未署名。」

蓋不知巴黎所藏六九一五之五號本缺最後半葉也；而又不知巴黎國家圖書館尙有六六九一之二號，則亦爲五葉本；今能得梵蒂岡本以影印之，亦一大快事也！

按又有名「鴉鸞並記」者，費賴之 (Louis Pfister) 「入華耶穌會士列傳」(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liographiques sur les Jésuites de l'ancienne Mission de Chine) 法文本第一冊二四一頁謂係駁詰楊光先者，則或爲另一書；裴化行 (Henri Bernard) 「西書漢譯考」(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 認卽廷筠所著，而係費氏誤記。

影印天帝考序

方豪

此梵蒂岡教廷圖書館所藏一抄本也，乃福建漳州教友嚴保祿（又作瑒）錄書經、詩經及四書中有關上帝之文，呈羅、萬、南、魯、羅、聶、李七教士以備參考者。

其人名諱，字定猷。又草有「詩書辨錯解」，見本書末。「口鐸日抄」訂正人之一清漳嚴贊，字化思，必其昆仲也。

按所舉七教士，可考者三人，略述如下：

1. 羅如望 (Joannes de Rocha) 杭州大方井墓碑作儒望，字懷中；萬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入華，天啓三年（一六二三）卒於杭州。萬曆三十七年（一六〇九）在南昌；四十四年（一六一六）在建昌；曾自建昌至漳州傳教，年代不詳。按泰昌年（一六二〇）儒望在嘉定建造第一所教堂。可知其赴漳州，必在萬曆末年，泰昌年之前也。

2. 李瑪諾 (Emmanuel Diaz senior) 字海嶽，葡萄牙人。萬曆二十九年（一六〇一）入華。其足跡曾遍歷韶州、南昌、南京、北京等處，天啓六年（一六二六）曾居嘉定。似未至福建。崇禎十二年（一六三九）卒於澳門。

崇禎三年（一六三〇）瑪諾曾上書耶穌會總會長，討論是否可以用「上帝」稱天主教所敬之神，其研究結果則為肯定的，按與本書合。

3. 聶伯多 (Petrus Canevari) 字石宗，國立北平圖書館藏中葡字典抄本，編目二二、六五八號，

附在華耶穌會士七十七人姓氏畧，作字與家。義大利人。崇禎三年（一六三〇）至我國。八年（一六三五）至福建，傳教於泉州、延平等處。清康熙十四年（一六七五）卒於南昌。

其他如南姓者，若以之爲南懷仁（Ferdinandus Verbiest），則年代相去太遠，不敢附會。

全書所錄有尙書之舜典、大禹謨、皋陶謨、益稷、甘誓、湯誓、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說命、泰誓、武成、洪範、金縢、大誥、康誥、召誥。詩經則錄有長發、皇矣、文王、大明、時邁、執競、敬之、庶工、假樂、板、蕩、雲漢、烝民、正月等篇。此外則論語、中庸、孟子。

最後爲「附愚論」，乃作者個人之意見，略舉如下：

「敝中邦古書，惟五經四子，其說可憑。」

「以今考之，古中之上帝，即大西之稱天主也。」

「初來諸鐸德，與敝邦先輩，翻譯經籍，非不知上帝即天主。但以古書中慣稱，見之已成套語。又後代釋老之教，目上帝以爲人類。又其號至鄙，其位至卑，俗人習聞其名不清，故依太西之號，紐攝稱爲天主，非疑古稱上帝非天主，而革去不用也。今愚憂新來鐸德，有不究不察者，視上帝之名如同異端，拘忌禁稱，諷敝邦上古聖賢以不識天主，將德義純全之人，等於亂賊之輩，邪魔之徒，其謬患有難以詳言者。故備錄經書所言，而略附愚論於後。」

「鐸德」爲「撒責爾鐸德」（Sacerdote）簡稱，指司祭，今稱「司鐸」或「神父」。「太西之號」言太西字母也；「紐攝」者，言子音字與母音字拼發爲音也，可見「天主」「上帝」二字實爲 Deus 之譯義兼譯音，舊作「陡斯」，亦作「天有主」。

世多知「禮儀問題」係利瑪竇逝世後，中國天主教傳教士之間，對祭孔、祀祖問題所發生之歧見，

關於「上帝」或「天」之能否用以稱天主教所敬之神，亦曾發生齟齬，此則知之者鮮，本書之可貴在此。

又本書作者福建漳州人，漳州在明季初爲耶穌會士傳教地；及多明我會士進入閩省，問題始發生，則所謂「初來鐸德」與「新來鐸德」殆即指耶穌會士與多明我會士而言也。乾隆七年（一七四二），教宗本篤第十四世，出諭嚴禁以「上帝」或「天」稱天主，並禁再起爭執，此類文獻，遂告絕跡，惟教會藏書樓中偶或見之耳。民國二十八年，教廷傳信部對於祭祖、敬孔之新令，尺度已極放寬，而不及「上帝」等問題；四十一年夏，余道經羅馬，謁傳信部秘書長剛恆毅（Celso Costantini），述及「上帝」問題，剛公謂所以避而不談者，免重起無謂之爭執也；若有必要而用之，教會將不加干涉。近年教中人亦多有採用者。影印此書，以存史料，儻亦好古者所樂聞歟？

影印天主實義續篇序

方豪

是書係梵蒂岡圖書館藏本，「清漳景教堂重梓」。共有三名：扉頁作「天主實義續篇」；目錄前作「天主聖教實義十二冊」又作「天主實義十二冊之第二」；書口作「天主實義」。

按「天主實義」爲利瑪竇所著書名，是書則龐迪我（Didacus de Pantoja）作。「迪我」亦有作「迪義」或「迪義」者。「萬曆野獲編」誤爲「迪義」。利氏原書未云有十二冊計劃，或有此計劃而未明言，龐氏繼之，故稱「續篇」；又以利氏之書爲第一冊，故此書乃稱「十二冊之第二」；以十二冊實爲一書，故書口仍襲用「天主實義」之名。

費賴之（Louis Pfister）「在華耶穌會士列傳——龐迪我傳」（*Notices biographiques et bi-biographiques*……）稱爲「實義續篇」，云係利瑪竇教義書「實義」之附錄。（此係直譯，馮承鈞譯本譯爲「瑪竇天主實義之續篇也。」）費氏未詳其板本。

裴化行（Henri Bernard）著「西書漢譯考」（*Les adaptations chinoises d'ouvrages européens*）云有抄本，約爲一六一七年（萬曆四十五年）物。一六五四年刊行之衛匡國（Martinus Martini）拉丁文書目收入。按衛氏目錄亦僅謂：

「Thien Chu xe y so pien（天主實義續篇）證明天主之存在，並充分解釋其特性。」

按衛氏所收皆係已刻之書，可知此書在明永曆八年（清順治十一年、一六五四）前已有刻本。就「景教堂」之名字而言，必在景教碑發現之後，最早當晚於天啓五年（一六二五）。

巴黎國家圖書館藏有三部，編號爲 Courant 6848, 6849, 6850，亦云有十二卷，僅存第二卷，清漳景教堂重刻本。可見巴黎所藏者，與梵蒂岡本爲同一板。

按此書亦收入高迪愛 (Henri Cordier) 著「中西文鉛槧」(L'imprimerie Sino-européenne) 第一七八號。

龐氏爲西班牙人，耶穌會創於西班牙，惟明季中國教區在葡人勢力範圍內，葡國享有保教權，故來華西士，必在葡京里斯本登舟，在澳門登陸，西班牙耶穌會士乃寥寥可數，龐氏則爲絕少數西班牙人之一。一五七一年生，一五八九年入會，明萬曆二十七年（一五九九）抵吾國，四十六年（一六一八）卒於澳門。

龐氏字順陽，所著書以「七克」最負盛名，收入「天學初函」，至爲人所樂誦。又有「受難始末」一卷，譯福音所記耶穌蒙難歷史，三百年來教會傳誦不衰。又有「龐子遺詮」二卷，則身後所遺者。拙著「從中國典籍見明清間中西文化關係」，見「中國與西班牙文化論集」，譽之爲「最偉大的西班牙漢學家」。禮部亦曾推薦修曆，全祖望鮑琦亭集「二西詩」指西洋與西藏，有云：「天官浪詡龐熊曆，地險深貽閩粵憂。」「龐熊」指迪我與熊三拔 (Sabbathinus de Ursis)，而所謂「西洋」者，即指澳門，全氏故有「地險」之憂。

此書教內久無傳本，今茲影印，甚盛事也。謹弁數言，以告讀者。

影印天釋明辨序

方 表

「天釋明辨」者，辨天主教與佛教異同之書也。書爲杭州仁和鄉賢楊廷筠所作。廷筠字仲堅，號淇園，萬曆二十年進士，官至監察御史及京兆尹。漢文第一部世界地理書「職方外紀」即公所彙記者也。奉教後，取聖名彌格爾，故又號彌格子。父兆坊，字思說，近學生書局所影印之萬曆七年杭州府志，兆坊以仁和縣儒學生列名考輯。

民國三十二年，楊振鐸先生以所著「楊淇園先生年譜」囑余校補，校既竟，並代謀在重慶商務印書館印行。其遺著目中有「西釋辨明」，當即此書，余與楊君皆不知也。既而讀古郎氏（Maurice Cou-rant）所編巴黎國家圖書館中文書目，則此書著錄於七〇九〇、七〇九一、七〇九二號，凡三部。第三部有拉丁文註，原爲傅爾蒙（Fournmont）藏書二五四號。勝利後，又獲在上海徐家匯、北平北堂等教會藏書樓獲見此書，與今所影印之梵蒂岡藏本，皆同爲一板。

是書無鐫刻年月，僅題：「勅建天主堂繡梓」，按北京天主堂東堂於順治十二年乙未（一六五五）蒙受欽賜，則此書之刻，當在清初。是否有更早之刻本？刻於何時？殆已不可考矣。

是書宗旨，在說明佛教乃「依傍天學」者，（原教）謂佛教：

「自西竺而遙傳歐邏巴之事，奧義已失却一半；用華語而譯番文，真義又失却一半；以江左名流，托言於佛，番非眞番，譯非眞譯，並其一半之眞義，漸滅不存。」

所謂「江左名流」，殆指錢塘名儒虞德園先生淳熙與西湖高僧蓮池大師，蓋二人皆有文攻擊天主教